

宋衍申 著

史家·史识·感情

吉林文史出版社

0661614

史家·史識·感情

宋衍申 著



0045758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八月



SHIJIA SHISHI GANQING
史家·史识·感情

宋衍申 著

责任编辑： 宋一夫

封面设计： 张颖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375印张 246 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1989年第1次印刷 印数：3300

长春市长航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ISBN7—80528—148—3/K·68 定价4.00元

自序

这是我的一本论文选集，所收入的32篇文章都是1982年到1988年这七年间发表的。

我所以把这七年间文章选为一集，是因为这期间我的研究精力相对集中到“通鉴学”这一中心之上。有的文章从题目上看，似乎与“通鉴学”无涉，而实际上是我探讨《通鉴》之学，得到启发而后写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此集之中无论是长篇，还是短论；无论是史学史方面的，还是唐宋史方面的文章，多数还是与《通鉴》之学有关的。所以，此集实际上是我的《通鉴》读书心得。

《通鉴》是我国古代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号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四库总目提要》语），读其书，确实可以收到“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元·胡三省语）之效。至于九百年来，在它影响下所诞生的数以百计可归属于“通鉴学”大家族的鸿篇鉅著，更是蔚为大观。可以说，治中国古史者，就不可避免地要涉足于《通鉴》之学这一领域。

又由于《通鉴》诞生以后就很快普及开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它在中国古代众多文献典籍中，几乎居于准经典的地位，所谓“六经以外不刊之典”，因而它对近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心理，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刻影响。今天，当我

们着力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之得失时，是不能置《通鉴》之学于不顾的，而应实事求是地批判继承这一份古代文化遗产。以上便是我几年来学步于《通鉴》之学的一点认识，也是我把这些文章集为一帙的原因。

入集的文章，有的原是忙里作成，发表之后才察觉到缺欠，甚至错误。这次选集时，对于凡是已经发觉有问题之处，均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修改或补充。尽管如此，在这32篇之中仍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敝帚而自珍，我还是大着胆子把这一不成熟的论集公之于世，借此广求批评，则是我的夙想。

目 录

自 序

史家·史识·感情·····	1
考据与历史研究·····	3
史书的体裁与内容·····	6
说“文人修史”·····	9
提倡史学家写点杂文·····	13

《资治通鉴》研究概述

——为《通鉴》修成九百年而作

（《〈资治通鉴〉丛论》代序）·····	15
---------------------	----

试探建国以来的《资治通鉴》研究·····	61
论《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	73
关于《资治通鉴补》·····	79
《资治通鉴》究竟附有多少“史论”？·····	99
读《通鉴问疑》札记·····	109

试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125
评司马光的经济思想·····	147
司马光文学成就述论·····	164
论司马光出知永兴军·····	186
司马光与庞籍·····	199

直书与中国的封建史学·····	211
宋代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	215

两唐书本纪繁简论·····	231
欧阳修治史的求实精神·····	250
论刘恕的史学·····	268
刘攽与《东汉刊误》·····	280

唐代的宦官与皇权

——兼论中国封建社会宦官专权的原因·····	290
“庆历新政”时期的谏官·····	301
是“重武”不是“轻武”	
——谈北宋的一项基本国策·····	312
李觏经济思想略论·····	316

“门生”的变迁·····	332
闲话眼镜·····	338
我国古代的稿费·····	341
欧阳修“任人”·····	345
姚思廉小传·····	352
少林僧兵杂说·····	356

史家·史识·感情

评价一位史家，不能不首先论其史识，因为“非识无以断其义”^①。即使有好的文笔，占有广博的史料，如果缺乏观察、分析、裁断的能力，那么只能“如愚贾操金，不能贸化”^②而无所作为。所以，才、学、识三长比较而论，识是灵魂。因此，我们对史识绝不能有所忽视。

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一位硕士研究生，平时的学习成绩堪为上乘，在写毕业论文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却望洋兴叹，一筹莫展了。原因呢？很简单，在平日的学习中，他只把自己当成一个“藏书之箱篋”，太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锻炼了。我们能过多地责备这位研究生吗？显然不能。指导教师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有一种说法：“材料掌握多了，自然就有看法了。”所以，攻读秦汉史的，只是一篇一篇地读《史记》、《汉书》；攻读隋唐史的，只是一篇一篇地读《两唐书》和《通鉴》的“隋纪”、“唐纪”，似乎这样就能在史学上有所建树。史家要尽可能地占有丰富的史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却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位的工作。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在史学领域中能否有所建树，首要的则是其史识的高低。郭沫若同志是公认的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自己就承认他掌握史料不如当代历史学家陈寅恪。郭老在史学上之所以有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乃是他用马列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做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科学解释，也就是

说，首先是由于他在史识上是第一流的。相反，某些座谈史料衮衮不穷者，因为史识不高，却在史学战线上很少建树。所以，治史之道不能光靠掌握材料去取胜，而首要的是加强史识的修养。当前在培养史学战线接班人的工作中，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史识的修养又与感情紧密联系着。所谓感情，也就是史家对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而做出的评价，自然会有褒贬毁誉之分，这种爱憎之情，人皆有之。恩格斯讲“愤怒出诗人”（引歌德语），是说写诗离不开感情，鄙意认为恩格斯的这一名言，也适用于治史者。翻开史册，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史学名著，都是史家激情的产物：《史记》是司马迁发愤的结果，《通鉴胡注》是胡三省怀恋故国的有为之作，已故史学前辈陈垣先生撰述《通鉴胡注表微》更是激于抗日爱国之情。可见，不朽的史著是不能脱离作者感情的。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感情与以往史家的感情大不相同。与“四人帮”时代御用史家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剪裁历史的感情更截然相反。我们的感情是在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伟大现实斗争中自然焕发出来的，是出自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责任心。有无这种感情，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不可指望对革命的现实漠然无情，妄图不染红尘，躲入桃花源中治史的所谓史学家，会有什么卓识的贡献。

所以，我们说史家、史识、感情是共处一个统一体中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它们分割开。

注：

①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1983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

考据与历史研究

粉碎“四人帮”以来这几年，历史考据的文章比前些年多了。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有分析的必要。

在中国的古代，考据与历史研究是共存共荣的。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后，历史研究成了真正的科学，这是否就抛弃了考据呢？根本没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都曾倾注过不少精力从事考据工作。这说明考据与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事有不尽然者。自从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和《红楼梦》研究以后，出现了一种偏向，似乎搞历史考据就是脱离政治，就是抵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考据被无形地划入了历史研究的“另册”，人们对考据工作怀有戒心，史坛上考据文章寥若晨星。十年动乱中，在当时只有帮史学以假作真的自由，而无正直史家去伪求是的权力，历史研究被推向了绝境。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历史研究也“枯木逢春”了。人们从痛切的教训中更加感到考据之于历史的科学研究是不可须臾分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考据被较多的人问津起来。所以说，近来考据的文章多了些，恰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反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更不必大惊小怪。

有一种看法：历史考据冲击了历史的正体研究。所谓正体研究，不外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研究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揭示。实践证明，越是这样的正体研究，越是要建筑在真实史料基础上，而绝不能脱离史料去放空炮。试想，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对李岩有无其人不需要弄清楚吗？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李秀成供词的真假不需要弄清楚吗？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大”的代表，南昌起义的情节不需要弄清楚吗？郭沫若同志在其《十批判书》中说：“无论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郭沫若同志的这段话是深中肯綮的。上述说明，考据是正体研究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紧密相连，绝无谁冲击谁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搞历史考据就是乾嘉学派。对乾嘉学派怎么看？应有一个全面的观点。长期以来，一谈到乾嘉学派，就是文字狱造成的，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其实不尽然。嘉乾学派所以蓬勃发展，成为有清一代之“显学”，主要原因应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安定和当权者对“文治”提倡这诸多根本的社会原因中寻找。我们不能不承认乾嘉学派的出现是学术大繁荣的表现，它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对乾嘉学者的思想也应取分析的态度。其中的一些人脱离现实搞无关痛痒的繁琐考据，是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另有一些人，他们在思想上上承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下启近代之民主思潮，他们搞考据实际起到了对传统观

念挑战的作用。当时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精通名物训诂，是乾嘉学派皖学的代表，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仅给当世人，也给后代人的思想以深刻的启迪。这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能说是与政治无关吗？！他的学术思想对我们今天也有继承的价值。所以，完全否定乾嘉学派是不正确的。

我们今天的考据学不是乾嘉考据学的全盘照搬，更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重演。我们的考据学的任务应该是对全部的历史遗产进行全面大清查，扫除所有的虚假和阶级偏见，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为两个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对这样的考据文章我们不厌其多，只嫌其少。

当然，在考据的实践中也会有不良的倾向出现。比如，有的考据学家自诩清高，认为只有考据才是过硬的学问，把考据抬到不适当的高度。这种思想倾向很容易同胡适当年所说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是同样的“一大功绩”的观点合拍。这样的考据思想我们就要克服。又如，有的考据家大搞繁琐的考据，甚至培养研究生也去做无关宏旨的考据论文。这样的倾向我们也要克服。

总之，我们应肯定考据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反对考据中的不良倾向。

（1983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

史书的体裁与内容

史书的体裁要创新，这已经是一种颇为广泛的呼吁了。

体裁是形式，形式向来为内容所决定。所以，要使史书的体裁创新，关键的问题还是求得史书内容要有所创新。

纵观中国史学史，不难看出史书的体裁与内容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在史学的童年，史官只分左、右，所谓“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①。当时的史书体裁原始而简单。这种原始而简单的体裁，与当时历史内容只限于帝王言行这一狭窄领域是相适应的。周代史官渐备，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分，诸侯国亦各有史官，从事史事的队伍扩大了，但是历史的内容仍限于天子和诸侯的言行，所以史书体裁长时期并无重大突破。到了西汉，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书的内容就不能为少数帝王的言行所局限，下层的贫民进入了史册，社会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也进入了史册。历史研究的范围被空前地扩大了。这种扩大的本身，也就是内容的一种创新，正是这种内容的创新，才造就了“纪传体”这一崭新的史书体裁的问世。在唐代，史学家杜佑亲历“安史之乱”那种礼崩乐坏的动乱，所以痛感研究总结历代典制沿革兴废，以救现实之弊的必要，于是而创成以典制为内容的专题史著——《通典》，这又是内容的创新造就体裁创新的一例。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这种事例是俯拾皆是的。

到了近代，章节目这一体裁由外洋舶来，并很快在中国史坛上扎下根，似乎成了不易之体。这种舶来的史书体裁，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完全是由于用这种体裁分层次、分阶段、分门别类地叙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发展规律来得更灵活更便当。它与中国的新史学冲破封建的旧史学的桎梏，把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当前社会现实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所以说，章节目体的生命力，也完全是由我国史学界研究内容的创新所决定的。

但是，社会在发展，历史研究也在发展。曾经被称为创新的体裁，也会变得陈旧起来、僵化起来，逐渐暴露其短处。就“纪传体”来说，它是在纠正古老编年体“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②的短处上，综合以往各种史体而独创的新体，在当时和封建社会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都是新鲜的、活泼的、富有生命力的史书体裁。但是，“纪传体”绝不是史书的永恒不易之体，不要说当今的史学界已经抛弃了这种封建的正宗史学的体裁，早在唐代，封建史学家刘知几就已经批评它“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等短处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似乎有鉴于编年、纪传二体皆为不恒之体，于是“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④，裁长补短，创制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年史体裁。诚然，《通鉴》之编年较《左传》之编年高了一个层次，但是曾几何时，袁枢“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⑤，创制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⑥的“纪事本末”体裁。可见，任何一种史书体裁都不曾是十全十美的。

史书体裁的创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当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席卷全球，各门学科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历史这门既古老而又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学科，自然也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应该要求历史研究要有时代感，从而不断地用马列主义做指导寻求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的新课题。我们这样说，决不意味着以往所研究过的课题，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一古脑儿抛掉；恰恰相反，有些古老的研究课题还有待进行新的认识。但是，也必须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研究的“热门”，在新时期就不一定还应该是“热门”了，更不必投很大力量去反而复之。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史书内容的创新。史书内容有了创新，史书体裁的创新就会应运而生了。如果舍却内容的创新，体裁创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注：

① 《汉书》“艺文志”。

②③ 刘知几：《史通》“二体”。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

⑤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1984、11、14《光明日报·史学》)

说“文人修史”

许多史学理论家都不主张搞文学的人修史。对文人所修之史，读者也格外生有警惕之心。因为确有一部分文人既缺乏直书实录的史德，又无视文、史的区别，他们修史往往虚加练饰，轻事雕彩，刻意文章。这样一来，史书也就“文非文，史非史”^①了。所以，文人修史不被人们所提倡和信任，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研究问题要用辩证法做指导，对文人修史，也须作几点具体分析方好。

首先，中国古代文史本来是不分家的。《论语》说：“文胜质则史”，这就是说“史者，当时之文也。”^②历史上许多大史学家，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同时也是大文学家；《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其它许多著作，本来就是集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于一帙的。所以，文人修史在古代是天经地义的。后来，由于“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才“文之与史较然异辙”^③。

其次，史学理论家们对文人修史的批评，也值得研究。

刘知几是较早批评文人修史的，《史通》一书的相当篇幅都与这个问题有关。但是，综观《史通》，我们不难发现他所批评的并不仅仅限于修史的文人，斗争的锋芒所向是六朝以来一切崇尚骈俪、华而不实的文人。当时，不仅文人修史搞骈四俪六，史家修史也搞骈四俪六。唐初入史馆的许多

馆臣，称不上文学家，可是他们也跳不出骈四俪六的窠臼。刘知几所反对的不是某个孤立的文人，而是反对那个时代的文风。。相反，他对既有史才又有文才的班固、沈约还十分称赞，他说：“其有赋述《两都》，诗载《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④刘知几不是不加分析地反对文人修史。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古文十弊”一章，是专门批评“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的，也不只是针对修史的文人，而首先是着眼于那个时代文坛上的不正之风。相反，章学诚不仅强调“史德”，也强调“文德”，主张“临文必敬”“合道德文章而一之”^⑤。

再次，某些被批评的修史文人，他们为文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新唐书》“传”的作者宋祁，就是一个被批评者。吴缜在《新唐书纠谬》“自序”中批评宋祁“独以文辞华采为先”，这个批评是很正确的，因为宋祁的确对《旧唐书》的许多记述做了避俗就雅的更改。但是曾公亮在《进唐书表》中却指出，《新唐书》比《旧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后人有人认为曾公亮所评，系溢美之词。但是清代赵翼所评总不会有溢美之嫌了吧。赵翼举了好多实例，然后也是称赞宋祁对《旧唐书》“力矫其弊”，《新唐书》“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一经对勘，优劣自见”^⑥。由此可见，宋祁这个修史的文人，虽然有“刻意文章”之弊，也还是有锤字炼句、排比剪裁之功的。

最后，文人修史所产生的弊端，也不宜简单地归咎于文人的个人品质。常常是“拘时之患”^⑦，不得不然。就以刘